

男同志親密關係家暴下正式與非正式支持網絡資源之探究—以情感支持為例

林育陞

壹、前言

家暴在臺灣家庭工作在概念對大眾來說如今已不陌生，經由各式宣導、教育，私領域關係如遇暴力事件，我們已不會將其視為個人家務事，而逐漸將各種專業資源導入衝突的私人關係中，社會大眾也開始對於家暴的概念與防治有更多和詳細的理解。臺灣自 1993 年鄧如雯殺夫案發生之後，大眾才體認到許多發生在家庭中的問題，不只是個人的事，而是需要社會整體一同面對的議題，故政府、民間推廣家暴工作十幾年來，已逐漸發展出一套防治家暴的網絡，並嘗試將社政、警政、司法和各種家暴案主可能運用到的資源整合在一起。

雖然家暴在近 10 年不斷演進與發展，學術和實務工作者的努力不斷被討論與精進，但同志親密關係暴力與家暴的問題卻沒因為家暴法的實施與演進而受到演進與保障，即使家庭暴力防治法在民國 2007 年納入保障同志伴侶在親密關係中

的安全，但在依舊保守的社會氛圍下，願意尋找協助資源的比例依然很少，臺灣的異性戀家暴救援網絡建構了 18 年，才有今日尚稱完善的服務輸送系統，其中是多少受暴者的血淚經驗來換取的，而直到 2009 年，熱線與現代婦女基金會（簡稱現代）共同合作的「同志親密暴力服務方案」出現，才開始嘗試在專業的家暴服務資源中開闢出同志友善的空間，針對同志關係暴力的協助。

因而本研究以社會支持網絡的觀點來看目前臺灣在同志關係暴力正式資源與非正式資源有哪些，並聚焦於情感支持的部分，透過理論的檢視來探析情感支持網絡的發展並提出日後可依循的方向，為本研究的重點。

貳、社會資本與社會支持網絡的探究

在探究社會支持網絡時，首先本研究先來瞭解社會支持網絡與社會資本間是怎

樣的關係與意涵。在有關社會資本的觀點，有重要論述的相關學者，來讓大家點單瞭點，研究整理下面主要對於社會資本觀點解各學者對社會資本的概念。

馬克思（Marx's）的觀點，社會資本包含人力資本的、文化資本、經濟資本等，往往是應用於經濟學和社會學學科。最近，社會資本的研究改變了研究人員的想像力，它提供了概念化社會世界的另一種資源互動方式，皆來自馬克思的想法。

林南（N. Lin）定義資本，意旨內嵌於社會網絡中的資源，個人在採取行動時能夠獲取和使用這些資源。因而，這個概念包含兩個重要的方面：一是它代表的是內嵌於社會關係中而非個人所有的資源；二是獲取和使用這種資源的權力屬於網絡中的個人。

布迪厄（Bourdieu），界定社會資本主，要是專注於制度層面的權力關係，為實際或潛在鏈接到占有或多或少制度化的關係，是一個持久的網絡的資源且相互瞭解和認同。簡單說，與群體成員相聯繫的實際的或潛在的資源的總和，他們可以為群體的每一個成員提供集體共有資本支持。社會資本理論布迪厄被看作是權力的一種形式關係的強大，可以通過與其他有權勢的人的連接保持強大的。

科爾曼（Coleman），界定社會資本是一種責任與期望、信息渠道以及一套規範與有效的約束，它們能限制或者鼓勵某些行為。社會資本存在於家庭的資源關係和社區社會組織。因此，社會資本是社會關係結構個人和個人之間。科爾曼延長社會資本的範圍擴大到包括非精英群體的社會關係，不同於布迪厄誰認為只有誰握有權力的人能夠獲得社會資本的好處。

普特南（Putnam），普特南肯定了社會資本的“社會生活的網絡，規範和信任，使參與者的行為特徵，一起更有效地去追求共同的目標。社會資本的特點包括：(一)社會網絡和密度，包括個人網絡和社區網絡。(二)公民契約。(三)當地公民身份。(四)在互惠合作的規範，在社會各界互動與信任。

簡而言之，社會資本的普特南的想法的好處概念化有一個特定的社區或團體中每個人同樣的影響，無論在個人行為或質的差異。在他對社會的不同的定義審查資本，認為社會資本的組成部分包括信任、社會規範、互惠，以及結構和網絡的功能和嵌入在其中的資源。他的社會資本概念超越了社會支持和社會網絡的觀點，因為它涉及到信任，公民參與和規範，這不僅關係到社會網絡，個體之間的聯繫，社會網絡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互惠和信賴的價值規範。

資料來源：Bourdieu, 1986; Coleman, 1988; Putnam, 2001; N. Lin, 2001; Webber, 2004; McKenzie & Harpham, 2006.

因此從上面資料來看，社會資本包含的面向是多元的，不同學者對於社會資本的定義與功能依自己理論發展有不同的學說與假設，研究者經上述簡單介紹認為社會資本有分成兩個面向，制度層面與關係互動層面。制度層面：研究者認為與個人所處的組織有絕對關係，如國家、社區、家庭等，這些場所所提供的規範是在制度有很大的影響，舉例來說，以國家為例，一個國家的強大，相對於人民在國家資源的運用上，就能有更好的分配。另外，以我國資源分配來說，北部的城市因規劃與制度較完善，相對來說比起中南部或偏鄉都市來說，更有良好制度面的社會資本。而關係互動上，就比較偏重個人互動連結部分，簡單來說，個人與他人互動狀態、連結，比較通俗的意思就是人際關，這會影響你手上社會資本多的多少。而制度與個人層面彼此不是相互獨立的而是互相影響。

而在文獻閱讀上 McKenzie & Harpham (2006)、Yamaoka (2008) 在社會資本的內涵探究上，與研究者所抱持看法有很大的相似性。他們提到社會資本類型至少包括兩個向度：

一、結構與認知社會資本(Structural and Cognitive Social Capital)

認知社會資本體現包括價值觀，利他主義，規範，互惠和公民責任的態度。認知的測量社會資本是關係到信任的水平或在一個社區或組織歸屬感。相比之下，結構社會資本的特徵在於網絡連接的行為方

面，包括的關係，協會，網絡和鏈接的個人和團體的和體制結構。結構性社會資本的測量往往是相關聯的網絡密度。例如，成員一個體育俱樂部或組織可以被看作是一個人的社會結構首都。

二、連接和橋接社會資本 (Bonding and Bridging Social Capital)

社會資本的另一個方面是由粘合和橋接是緊密聯繫的一種形式。連接可解釋要向內集中，人們關注的同質性，忠誠度，較強的規範和排他性，如人一個人自己的社區或類似的社會身份。在這些關係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強大密切。

透由上述可理解到社會資本其主要的意涵，本研究在此部分為何先討論社會資本與支持網絡的關係，主要在過去實務現場上，發現大多數人都會將社會支持網絡等於社會資本，但從文獻蒐集可發現社會資本是更大面向的資源綜合，社會支持網絡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因此，未避免混淆兩者關係而加此章節論述，下節將會探討社會支持網絡相關意涵。

參、社會支持網絡的意涵

一、社會支持網絡的理論根基

理論概念的形成與發展，並非憑空想像出來的，相對的社會支持網絡的建構也是依循某些理論所發展出來的。John Tolland and Donna Carrigan (2012) 年提到復原力概念外，也提到另一個與復原力密切關係的理論社會支持網絡，他提到此兩者

都立基於 Bronfenbrenner 的生態系統模式，適合引導跨越時間和情境下，對於塑造人類發展的複雜結構和互動的理解。在此模式中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生活圈且置身於系統（microsystem）中，例如：家庭、學校、同儕、鄰居；還有更大的社會情境之鉅視系統（macrosystem）。生態模式強調各體系間的連結，其所強調的體系概念，有助於提醒社會大眾的注意，許多發生家暴的外籍配偶家庭，可能有「社會孤立」與缺乏「社會支持網絡」的問題。Cohen & Wills（1985）、周克華（民 94）、周美慧（民 96）也指出，生態模式（Ecological theory /life model）強調個體處於的生態環境，系統中支持程度會影響個體的生活適應。

Osher, D., VanAcker, R., Morrison, G. M., Gable, R., Dwyer, K., Quinn, M.,（2004）指出，從建構良好學校社會支持系統對學生具一定的幫助。另外，Debra M. Hernandez, Jozefowicz-Simbeni（2008）指出，生態模型是瞭解人類發展與社會環境的相關影響，對那些處危險系統的人們，提出社會工作者應從中發現危險因子，建構正向的支持網絡來增強預防工作。

施彥卿（民 98）提到生態系統的兩個基本概念，可以勾勒出生態系統觀點的架構：一、交流（transactions）：個體會與環境間互換交流，每次的交流累積使得人與環境得以互相模塑、互為改變，甚至是相互影響，彼此交流並非簡單的線性互動（interaction），而是一種循環回饋的過程，並非僅是單純的線性互動而使兩者之

間互為因果關係（reciprocal causality）。

二、適應（adaptation）：當個體與環境交流時，將積極地努力投入，及設法改善個人，使其有能力運用環境中的任何一個機會，同時並努力於改善環境，使其對個人的需求、權利和目標有最佳的適應。

從上述來看，人的發展是與生態環境系統相互運作而成，系統中的各項因素皆產生一定影響力，而這些影響力是透過微視系統直接傳遞給人們。因此，生態系統變化是會影響人們所處的環境。此外，不管是系統中威脅或優勢都對人們有一定影響。正向支持性的環境對個體的發展是有助益的。

二、社會支持網絡的功能

社會支持網絡是個人自身網絡結構的互動和支持，所以人其生活的地方一定會發展相關的網絡出來，透過支持網絡的出現才能建構一個人日常生活的需求，研究者從相關的文獻中找到學者對於支持網絡功能的討論。

Cohen, Arad, Iorber 和 Pollack（2007）指出，社會支持和社會壓力之間是呈現負相關，擁有社會支持越多的人壓力愈少，相對地，愈少社會支持的患者壓力愈多。林信言（民 97）指出，社會支持的主要功能在於：一、提供適時的緩衝以減少情緒的起伏。二、提供多方位的思考面向，以增加認知的廣度。三、提供人力、財力與物力資源，解決實質上的困難。四、藉由對個體的尊重，增加其自信及價值感。王齡竟、陳毓文（民 99）檢

視過去相關研究後可發現，社會支持對憂鬱情緒有直接的影響外，也具有緩衝保護的作用，當個體在高衝突的情境下，社會支持具有緩衝、保護的效果，保護個體遠離憂鬱、焦慮等症狀，並維持一定程度的生活品質。

三、社會支持網絡對於復原力支影響

李俊良（民 89）提到建構復原力從個人和外在部份來看，個人主要是案主自我個性、對事物的看法、案主自我功能等，而外在就如同研究所強調和探討的資源網絡的支持性。簡單說復原力是案主與負面環境互動中去發展出來的，而它包含了個人內在和外資源部份。而這些案主所具備的內外資源就是案主的保護因子。

（一）心理資本建構

因此，內在資源建構上，余民寧、陳柏霖、湯雅芬（民 101）提升案主的心理資本是重要的，而心理資本包含「自我效能」、「希望」、「復原力」及「樂觀」是由此四個因素所組成的，能幫助個體面對其內在衝擊的抗衡因子。而 Luthans, F., & Youssef, C. M.（2004）結合正向心理學與正向組織行為學的觀點為理論框架，在分析傳統的經濟資本、人力資本及社會資本的特點後，提出以人的正向心理力量為核心的「心理資本」（psychological capital）概念。

Luthans 等人認為心理資本超越傳統

對於資本的定義，能夠透過開發而提升個體的競爭優勢。心理資本是一種個體積極心理狀態之發展，當個體擁有正向的心理建構時，便會具備下述特點：有信心對具挑戰性的事物承擔責任並付出努力，並且對現在及未來之成功做正向的歸因，依循此信念持之以恆達成目標，且在必要時，能重新定位目標及方向，進而透過困境與挑戰，維持或超越現況而獲得成功之概念（Luthans, Youssef, & Avolio, 2007）。

丁鳳琴（民 99）也提到一位具有豐厚心理資本的個體，會對自己有信心、肯努力、抱希望、具復原力、且能表現出樂觀積極的態度。尤其，心理資本理論的發展愈趨成熟，相關研究者對於心理資本與情緒幸福感所扮演的關係，亦逐漸受到關注。

（二）社會資本中社會支持網絡建構

案主所具備的網絡提供案主很多不同的需求，當案主面臨重大傷害事件時也會提供案主一定程度的幫助，在方紫薇（民 97）透過這樣的方式來使案主面對重大傷害時有一定的幫助，而她整理學者對社會支持類型的分類，提出有三種社會支持功能的支持網絡中最常出現的類型：1.情緒支持（emotional support）包括關懷、愛及同情。2.工具性支持（instrumental support）提供物質或行為上等實質之協助。3.資訊性支持（informational support）提供解決文提之引導、建議、訊息或回饋。

社會支持網絡依照案主使用方式的不同而會產生不同功能的面向，而透過這些

社會支持的功能幫助案主去處理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問題或難事，廖雪如（民 95）指出，社會支持也是社會網絡的一項功能，在人際互動中，能提供個人生活需要的滿足，以協助個人適應生活的各種壓力。透過社會支持與網絡中的資源，以滿足日常或緊急情境之功能性需要，減少生活事故對於幸福的不利影響。

黃寶圓（民 99）；李勉禎（民 98）；林永盛（民 96）；陳美玉（民 99）；蘇惠君（民 96）；Coheh and Wills（1985）。都指出社會支持網絡兩種功能，一種稱為主要效果（direct effects），另一種稱為緩衝效果（buffering effects）。1.主要效果：是指可以忽略壓力的數量及強度，認為社會支持的增加能夠降低精神上的壓力（psychological strain），藉著社會支持將減少環境中壓力源對於個人的衝擊。個體不論是否處於壓力下，社會支持程度增加，個人的生理與心理適應就愈佳，社會支持能滿足個人重要需求並提升個人幸福感及增進健康。2.緩衝效果：緩衝效果是個體在高壓力情境下，社會支持能發揮其功效，低壓力情境下則效果不明顯。個體在知覺壓力事件來臨時，有人會提供必要資源及協助，則會提高個體處理問題的自信心，並增加其因應能力，也就是社會支持對壓力的緩衝作用。因此可知，內在心理特質培養與外在支持系統建立是復原力很大的兩大特徵，也是我們所必須理解的重點。

肆、男同志親密關係暴力探討

魯世博（民 102）提到，親密關係暴力的發生並不僅止於異性戀的情感型態，相較於以異性戀為主的暴力防治議題，男同志戀親密關係暴力的現象少有人看見與重視，在相關敘事研究中發現，男同志戀者在異性戀主流社會下，迫於身分的敏感，對於暴力經驗往往難以開口，就如同處在雙重的櫃子裡，只能自己默默承擔。

此外，男同志戀者的暴力經驗不乏肢體及精神上的虐待，包括恐嚇、自殺騷擾等。而且值得關注的一點是，在不友善的異性戀霸權環境中，強迫出櫃的威脅便是針對同志戀者所特有的暴力手段，對於男同志戀者而言，外在眼光所帶來的壓力往往在心理上造成很深的影響。

李尚（民 104）針對男同志親密關係暴力的普遍性，眾多研究指出男同志一生曾經歷親密關係暴力之經驗，介於 15.4% 至 51% 之間。此外，相關研究表示，針對曾遭受男同志伴侶的親密關係暴力者，其暴力形式比率，精神暴力占了 32%～78%，肢體暴力占 12～45%，性暴力 5～33%；另外，一項針對 18 至 24 歲的男男性接觸者之親密關係暴力研究中，也有相同發現。

由此可知，精神暴力的形式為男同志親密關係暴力當中，最為常見的暴力手段。不過，即便研究數據顯示男同志親密關係暴力的高盛行率，仍尚未被社會大眾所關注。

香港在 2006～2007 針對「同性伴侶家庭暴力研究問卷調查」了解同志間親密暴力的現象，研究結果中顯示，家庭暴力

確實存在於同性伴侶之間，而且問題嚴重。根據「同性伴侶家庭暴力研究問卷調查」，在 219 對同性伴侶（包括同性戀及雙性戀者）當中，33%的同性伴侶表示有不同程度的家庭暴力曾經發生，其中 16% 表示曾給伴侶身體攻擊，以持續的言語辱罵、精神虐待、行蹤經常受到監控及性侵犯為五大最常發生的家暴行為。同性伴侶可能由於體格相近，在受到暴力攻擊時，20%的受訪者表示會還手。在受虐行為當中，男性首三項遇到的行為順序為禁止見/聯絡朋友及或家人、需要送院醫治的嚴重肢體暴力，及禁止出席同志活動。首三位主題問題為持續的言語辱罵、精神虐待及不需要藥物治理的肢體暴力。

李姿佳等（民 102）和李尙（民 104）研究提到，現代婦女基金會與熱線為了探究我國同志親密關係暴力盛行率，於 2012 年 8 月份進行「同志伴侶親密關係暴力問卷調查」，採用自填式網路問卷調查，共回收 493 份問卷，其中生理女性占 66%（328 位）、生理男性占 27%（133 位）、男跨女占 1%（4 位）、女跨男占 5%（25 位）、雙性占了 1%（3 位）。該研究發現：35%（161 位）曾經歷親密關係暴力；在 161 人當中占 45%（73 位）遭受暴力後，曾向外求助；在 73 人當中占 93%（67 位）曾求助於非正式管道。此外，針對我國男同志是曾否聽聞身旁友人遭受親密關係暴力虐待，在 439 位同志受訪者中，曾聽聞者占 51%（235 位）；而 235 位僅 35%（82 位）曾對外求助。

研究者整理國內對於男同志親密暴力

的形式，經調查前三名如同香港研究調查有一致性的關係，主要前三名為一、肢體暴力：用手或拳頭推、撞、抓、打你；對你用刀、槍、或是其他武器、危險物品威脅你或攻擊你。二、精神暴力：以粗俗、不堪的言語辱罵你或貶抑你；去學校或工作場所騷擾你；威脅要傷害你或你的家人、朋友；以自殺或自殘威脅你要繼續維持伴侶關係；控制你的財務、經濟或要求你負擔所有的開支；損壞你的財產；傷害你們共同養的寵物或你心愛的物品。三、性暴力：強迫你發生性行為；如果你不配合他的性要求就會變得很生氣；阻止你從事安全的性行為；故意傷害你的性器官或性虐待，為親密暴力形式最主要形式與內容（李姿佳、呂欣潔、杜思誠、林昱君、溫筱雯、黃心怡、陳淑玫、彭治鏐，民 101；李姿佳、彭治鏐、呂欣潔，民 102；李尙，民 104）。

由上述可看到香港與臺灣針對男同志親密暴力的探討與現況調查，可以知道男同志的親密暴力行為並不亞於異性戀家暴，但因為同志身分的關係、社會價值、出櫃與否的不同，因而面對家暴時才處於被動或是不求助的現象。這些「只看得見異性戀伴侶」的社會氛圍與制度，對同志伴侶造成相當大的壓力，讓同志在經營伴侶關係上，比異性戀更為辛苦。不僅同志伴侶起衝突的原因，經常來自外在的社會壓力，如：原生家庭逼婚、得向周遭親友隱瞞雙方的同志伴侶身分、雙方關係不被法律保障等；也讓同志朋友在萬一遭遇伴侶暴力時，會因擔心自己想求助的對象、

單位對同志不友善，而卻步不敢求助，成為獨自面對暴力行為、完全孤立無援的狀態。

伍、我國在男同志家暴正式與非正式網絡之探究－以情感支持為例

一、正式情感支持網絡的部分

(一) 政府體制中為主家庭暴力防治網絡對同志的不友善

在我國家庭暴力防治網絡還是最主要提供保障與防護的來源，我國「家庭暴力防治法」於 1998 年通過，1999 年 6 月 24 日全面實施，各縣市政府依法成立家庭暴力防治中心，業務包括 24 小時電話專線、被害人緊急救援、協助診療、驗傷、證據取得、緊急安置、心理輔導、住宅與就業協助、法律諮詢、被害人身心治療轉介、追蹤輔導等。由於政府公權力介入與支持，因應縣市政府的需要，各地家暴婦女庇護中心紛紛成立，有些財團法人福利機構在家暴法實施之前已經成立婦女庇護中心，但是經費困頓，直到政府正式補助經費，組織與功能才逐漸健全專業化。藉於此，家庭暴力防治開始成為我國福利體制的重要一環，而家庭暴力防治的受家暴者範圍開始從我國婦女到老人、兒童、男性，到 2007 年也修法通過同志是用於家庭暴力法，避免更多受暴者處於家庭暴力的陰影下。

因此理應該，家庭暴力防治網絡除了

提供基本法治保護外，一線工作者的心理支持是一個主要的來源與幫助，但從相關文獻分析發現，看到大多為外在環境對同志的不友善所造成心理支持不足是普遍的現象。謝文宜（民 98）、呂欣潔（民 102）、羅燦煥、潘琴葳、王秋嵐、黃思純（2011）提到，一線的家暴社工及其相關社政、警政、司法體系等所建構成的家暴網絡相關機構，對於同志族群依然非常的不了解，其中也不乏帶有歧視與偏見的相關工作人員，這樣不僅是將需要協助的同志案主排拒在外，更遑論要去處理如此細緻的同志親密關係衝突或暴力。

而李尚（民 104）研究提到，為何男同志都不願向正式機構、或家暴等相關單位求助，主要原因包含：欠缺可信任的管道、認為相關支持系統欠缺性別知能、認為暴力事件不具嚴重性、對相關支持系統的陌生、擔憂自身的性傾向曝光、不願擴大暴力事件的嚴重性、擔憂伴侶的事後反應、認為約會關係不符合支持系統的協助條件。因為社會對男同志的不友善致使法治無法保護當事人，一線家暴工作者缺乏性平概念對於受家暴的同志無法給正向支持與照顧，因而使心理支持部分無法獲致良好提供。

(二) 民間機構雖能提供情感支持卻無法完全代替政府網絡

目前對於服務男同志或是擴大於女同志、雙性戀、跨性別等機構越來越多，例如，社團法人臺灣同志諮詢熱線、臺灣同志遊行聯盟、臺灣女同志拉拉手協會、同

光同志長老教會、臺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協會等，對於同志致力於相關親密關係暴力服務，2009 年熱線與現代婦女基金會共同合作的「同志親密暴力服務方案」出現，才開始嘗試在專業的家暴服務資源中開闢出同志友善的空間，針對同志關係暴力的協助，致使在男同志心理支持在這些機構上能得到較正向的幫助，但卻無法取代政府機構所提供家庭暴力防治網絡的功能。

首先，主要是以臺灣資源分配來看大多福利機構都趨向於北部聚集為居多，即便有分單位立基於中南部，其機構資源還是不比原單位多。再者，家庭暴力所影響範圍很大，因此合作單位相對也比較多，專門服務同志機構的單位，雖然有專門合作的網絡單位，但是否能夠影響政府部門的單位願意合作是個問題。另外，如沒有專門合作或是相互協助的單位，政府的單位還是主要具公權力的體制，且遍佈範圍相對較廣與更多決定權，藉此，完全不靠政府單位來協助男同志親密暴力是不可能的事情。最後，回歸到法律保護問題，政府單位還是最後決策與保護機構，這是民間機構難以取代的部分。

因而從上述可知，在心理支持關懷上，政府體制面對問題是不友善對待男同志親密關係暴力，而在民間機構上則是沒有政府單位絕對的公權力，如兩者無法改善與合作即便民間機構的心理支持強，也無法致使男同志能有完善照顧。

二、非正式情感支持網絡的部分

(一)失去家庭情感支持後盾的男同志的哀愁

魯世博（民 102）提到，在東方文化上家庭成為男同志在身份認同上占很大的地位。主因我國文化與西方文化不同在於家庭支持一直是東方文化支持來源很大特色。李姿佳等（民 102）研究提到，在男同志心理支持協助上，家庭還是占據很大的地位，特別是家庭成員能夠認同男同志身分，對於男同志來說心理支持與協助會比起其他同儕、老師、朋友支持來得強烈，這取決於與我國東方文化在家庭角色的重要性。

畢恆達（民 92）針對男同志在與家人關係研究上提到，向父母現身是同性戀面臨的最重要卻又最困難的挑戰。其研究總計訪談了 32 位從 16 歲到 42 歲的男同志，研究結果提到，現身之後父母經常採取否認的態度，或自責教養方式有誤，或質疑小孩被朋友帶壞，同性戀成為一個不能碰觸的禁忌，一道不能揭開的傷口。有的父母有程度接受，事實上是接受自己的小孩，但不能接受同性戀。

因此，父母可能仍擁有刻板印象，因此擔心小孩受到社會歧視、孤單、得到愛滋病、失去男性氣概等。只有極少數的例子，因親子關係良好，父母的態度本來也較為開放，父母會嘗試去理解同志兒子的處境，進而提供支持。因此在以東方家庭為主的社會中失去重要的家庭支持，其心理支持的主要來源將失去絕大部分。

(二)其他來源情感支持網絡不足

鍾道詮（民 98）針對教育、職場、社會對男同志支持研究探討。發現到在教育上，臺灣各級學校教材仍以異性戀思維為主，不僅看不見同志，甚至還是反同志，例如陳述同性戀是異常與變態；同志團體編寫的參考資料，也未得到學校採用。《性別平等教育法》已明訂保障同志學生受教權，但校園內同志學生受教環境仍有改善空間，同志學生與教師在教育體系所面臨的困難，和個人特質、學校成就、是否獲得相關資訊、有無支持性團體都是很大的考驗。

在職場上，社會的不友善使不少同志得面對職場障礙，雖《就業服務法》規定雇主不得給予同志員工差別對待。同志在職場上所遭遇的問題多來自「不友善的工作環境」例如，同志得面對職場對單身者的刻板印象，或既定性別規範。

社會文化風氣的保守，也致使男同志在其他心理支持來源上受到侷限。因此，如現身後，男同志是否能夠在教育、職場、社會上能得到原有的待遇，或是可以得到正向的心理支持，以目前我國文化來說還是一個需要解決的阻礙。

陸、結論與討論

一、討論

（一）情感支持普遍不足

心理衝擊會造成男同志不同歷程的變化，如上述提到，在心理支持不足上，身分出櫃與否對於面對親密關係暴力時，受

暴男同志最貼身的支持網絡，家人、朋友、同儕等能否從他們身上得到立即的心理支持，對於未現身或是現身遭受家庭關係斷絕的同志來說是一大資源不足的部分，主要是出櫃身分後的壓力對男同志產生心理壓力最大挑戰，也因如此像家人、朋友、周圍親密關係的人求援機會就會變少。

（二）社會文化的不友善

可知，1.外在環境的不友善；2.對同志的歧視；3.一線網絡對同志的服務協助的不敏感與熟悉。主要是造成男同志在家暴下即便向外求助，也無法從中獲得良好的資源協助，這與大環境下異性戀意識有很大的關係，因而造成實質支持無法有效協助男同志家暴防治，這是實質支持尚欠缺的部份。

（三）男同志協助資源不足

資訊上，如同文獻了解到目前針對同志專門的服務都在建構當中或剛起步，因此很多訊息是男同志們皆不完全清楚的，因此如何提升管道與宣導，就是機構一線人員需注意的部分。且在資訊的不足，比較在於合適於同志的服務管道不足，這也是目前致力於同志服務的機構，如露德基金會、現代婦女基金會、同志諮詢熱線等。現在所建構的主要目標，建構合適於同志服務的管道與資源。即便男同志願意向外求援但也會因受到法令體制的歧視和影響，對於他們可能採取不友善的態度，使男同志遭受到二次的傷害，而這部分就

聚焦於家暴法治網的體系對於男同志的態度與實質幫助的影響。

二、建議

(一) 建立友善環境

建立友善環境，是一項具挑戰且長遠的道路，主要須消除社會大眾的歧視，因為擴及範圍較廣，在此部分主要聚焦三個部份的宣導，分別有：1.針對家暴網絡部分：以積極的在職同志教育，消除家暴網絡體系的性傾向歧視，去看到同志伴侶在社會處境下的結構性議題，並免將之視為個人問題。2.針對校園環境部分：建議學校應主動提供同志研究或活動相關資訊以及協助，讓學生能夠有機會認識同志。雖然不分男同志或女同志議題的合流方式，有其必要，但是對於男女學生在面對男同志和女同志議題，心理的處境以及所面對的社會壓力不同，所以進一步建議必要時可採取分流的方式進行，也就是分別提供以男同志或女同志議題為主的研習或活動，讓學生機會更進一步認識男同志和女同志的不同以及需求，也讓男同志和女同志的聲音都可以同時被聽見，以建立多元性別，尊重包容的友善環境校園。3.針對職場與社會同志：建立相關法規保障、與同事或主管交情互動等，以減少同志在工作受到無理的對待與歧視，並協助受脅迫同志協助解決問題，並能夠安心回到職場生涯

(二) 工作者敏感度提升與心理支持培養

檢討現行以異性戀為出發點的各級家暴處理模式，改用性別中立與同志友善的語言。不預設求助者的另一半為異性，而使用「伴侶」、「牽手」等性別中立稱呼，可在諮詢過程中觀察求助者的親密關係樣貌。另外，同志在其生活中定會使用非同志社福機構的服務，助人工作者工作任何一門課都可含括同志議題，同志議題被納入工作教育中，希望經由教育讓學生與社工員在面對同志案主時，不會因為恐慌或負面印象，而違背傳統精神，傷害同志。

另外，鍾道詮（民 98）和呂欣潔（民 102）；也提供工作者在心理支持上須注重的部分，1.不要在未進行身分認同探索前，隨便給予求助者不適合的性身分標籤。2.當尋求協助者對自身性身分感到懷疑時，瞭解其內在的心理掙扎，並進行探討。3.提供相關資訊與情緒支持給尋求協助者，增加其面對認同過程時可運用的能力。4.處理尋求協助者相關重要他人的情緒與不安。

(三) 針對社政、警政、司法等家暴網絡體系正確同志教育建構

自從家庭暴力防治法通過以來，家暴網絡逐漸建立，更有許多政府資源介入，希望在民眾的心中突破「家庭暴力為個人家務事」的錯誤概念，更期待許多悲劇可以及早發現，盡快導入資源協助。但十幾年來的各種教育與宣傳內容，皆未曾納入多元家庭之概念，多將家庭暴力塑造為「夫打妻兒」的單一樣貌，（呂欣潔，民 102；羅燦煥、潘琴葳、王秋嵐、黃思

純，民 100；李姿佳、彭治鏐、呂欣潔，民 102）。

故同志社群內部對於家庭暴力／親密暴力的認知、想像也在這樣的異性戀脈絡下建立，以致於同志社群一直認為這是距離己身非常遙遠的事情，在社政、警政、司法人員的培訓過程便導入同志教育，提升多元性別的敏感度與相關知能，並在研究與實務界發展多元性別者皆適用的處遇方案。於各個階段的家暴網絡，建立同志

友善諮詢資源的合作關係，期待工作者能意識到自身性別敏感度的狀況，而適時地尋求資源。

（本文作者為社會工作師，台大醫院兼任研究助理員，台北市立大學教育所教育心理與輔導組博士生，園藝治療師，初級動輔師）

關鍵詞：社會支持網絡、男同志、情感支持

📖 參考文獻

- 丁鳳琴（2010）。心理資本與主觀幸福感的關係探討。寧波大學學報，32(1)，64-69。
- 方紫薇（2006）。大一新生網路不同來會支持、網路沉迷及孤寂感之研究。中華心理衛生學刊，21(2)，139-168。
- 王齡竟、陳毓文（2010）。家庭衝突、社會支持與青少年憂鬱情緒：檢視同儕、專業與家外成人支持的緩衝作用，中華心理衛生學刊，23(1)，65-97。
- 李俊良（2000）。復原力對諮商的啓示。輔導季刊，36(3)，32-36。
- 李勉禎（2009）。老人自由需求符合程度、社會支持與幸福感之相關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姿佳、呂欣潔、杜思誠、林昱君、溫筱雯、黃心怡、陳淑玫、彭治鏐（2012），衣櫃中的傷痕—同志伴侶親密暴力自助手冊。財團法人現代婦女教育基金會、社團法人臺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編制。
- 李姿佳、彭治鏐、呂欣潔（2013），衣櫃中的傷痕：同志伴侶親密暴力現況調查初探與實務經驗分享。社區發展季刊，142，202-213。
- 李尚（2015），男同志親密關係暴力之初探：暴力樣態、導因與因應策略。台北：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論文。
- 余民寧、陳柏霖、湯雅芬（2012）。大學生心理資本量表編製及其相關因素之研究。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8(4)，19-52。
- 呂欣潔（2013），櫃中荊棘：同志親密暴力與現行家暴網絡之違和。婦研縱橫，94，1-8。
- 林信言（2008）。臺北市新移民子女社會支持與自我概念關係之研究—以國民小學高年

- 級為例。臺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育政策與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永盛（2007）。新移民子女社會支持與生活壓力之調查研究－以基隆市國民小學為例。臺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政策與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周克華（2005）。從生態模式探討外籍配偶家庭暴力之處遇。南華社會學通訊期刊，49。
- 周美慧（2007）。從生態系統觀點探討新臺灣之子的生活適應－以台中縣國小學童為例。台中：私立靜宜大學青少年兒童福利研究所碩士論文。
- 施彥卿（2009）。從生態系統觀點探討精神障礙者的自我概念－以南部某醫學中心為例。台南：私立長榮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 陳美玉（2010）。新移民女性的家庭地位、社會支持對文化認同之影響。宜蘭：私立佛光大學社會系所碩士論文。
- 畢恆達（2003）。男同性戀與父母：現身的考量、策略、時機與後果。女學學誌－性別與婦女研究，15，37-78。
- 黃寶園（2010）。社會支持在壓力反應歷程中的中介效果。中華心理衛生學刊，23(3)，401-436。
- 廖雪如（2007）。臺北市新移民會館對新移民社會網絡及生活適應之影響。台北：私立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魯世博（2013）。男同性戀者親密關係暴力之初探。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 鍾道詮（2009）。從臺灣同志社群處境思索社會工作可提供之服務。社區發展季刊，127，134-152。
- 謝文宜、曾秀雲（2010）。進入伴侶關係：初探臺灣同志的伴侶選擇偏好。輔導與諮商學報，32(2)，27-46。
- 羅燦煥、潘琴葳、王秋嵐、黃思純（2011）。我國同居親密關係之暴力樣態、歷程及服務需求研究，內政部委託研究報告（PG10003-0754）。
- 蘇惠君（2007）。外籍配偶在台社會支持網絡之研究。台中：私立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
- Bourdieu.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Richardson, J.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 Coleman. (198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5-120.
- Cohen, M., Arad. S., Lorher. M., & Pollack. S. (2007). Psychological distress, life stressors, and social support in new immigrants with HIV. Behavioral Medicine.

- Cohen, S., & Wills, T. A. (1985). Stress, social support, and the buffering hypothe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98(2), 310-357.
- Debra M. Hernandez Jozefowicz-Simbeni (2008). An Ecological and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on Dropout Risk Factors in Early Adolescence: Role of School Social Workers in Dropout Prevention Efforts. *Children & School*, 30(1), 49-62.
- John Toland & Donna (2011).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resilience: New concept, new opportunities. *Schoo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February vol. 32. P.195-106.
- Lin, N. (2001).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uthans, F., & Youssef, C. M. (2004). Human, social, and now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management: Investing in people for competitive advantage.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33,143-160.
- Luthans, F., & Youssef, C. M. (2007). Emerging positive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Journal ofManagement*, 33, 321-349.
- McKenzie, K., & Harpham, T. (2006). *Social capital and mental health*: Jessica Kingsley Pub.
- Osher, D., VanAcker, R., Morrison, G. M., Gable, R., Dwyer, K., Quinn, M., (2004). Warning Signs of Problems in Schools: Ecological Perspectives and Effective Practices for Combating School Aggression and Violence. *Schools', Journal of School Violence*, 3(2), 13-37.
- Putnam, R. (2001). Community-based social capital and educational performance. *Making good citizens: Education and civil society*, 58-95.
- Webber, M. (2004). Mental health and social capitals * Author's repl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184(2), 185-b-186. doi: 10.1192/bjp.184.2.185-b.
- Yamaoka, K. (2008). Social capital and health and well-being in East Asia: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Socialscience & medicine* (1982), 66(4), 885.